

《做人做官》系列丛书

做人做官

思想观点归纳篇

吴玉叶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做人做官. 思想观点归纳篇 / 吴玉叶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115-0528-6

I. ①做… II. ①吴… III. ①领导学-研究

IV. ①C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5973 号

书 名:做人做官——思想观点归纳篇

作 者:吴玉叶

出 版 人:董 伟

责任编辑:银 河

封面设计:叶培冲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65369530

编辑热线:(010)65369525

网 址:www. peopledailypress.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合肥朝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110 千字

印 张:15

印 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5-0528-6

定 价:36.00 元



《做人做官研究》编委会在京召开编委会议

2011年6月26日下午,《做人做官研究》编委会主任、总编辑兼中国做人做官研究网总编辑吴玉叶在中共中央党校宾馆主持召开了编委会,参加会议的编委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杰、向春玲、徐祥临、梅敬忠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樊锐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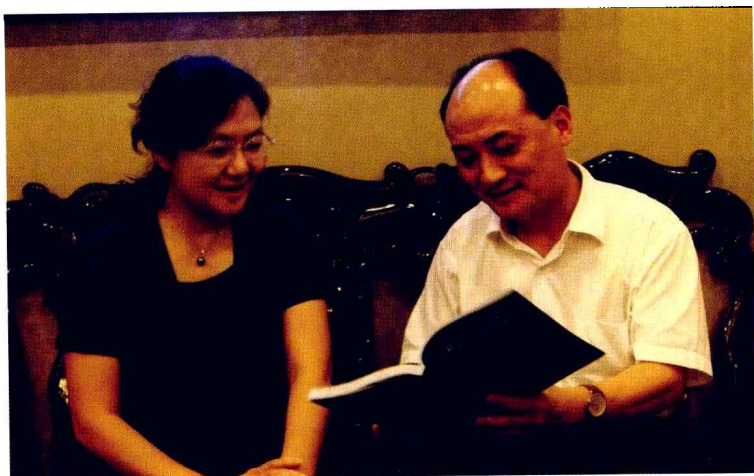
与会人员就做人做官课题研究以及网站、丛书出版等工作畅谈了各自的想法。编委们认为,做人做官是个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课题,很有必要共同努力把它做好,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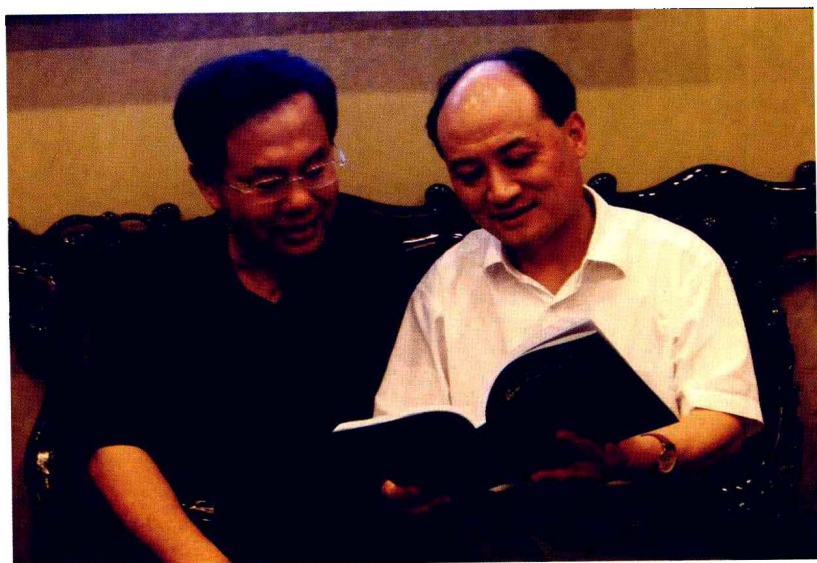
做人做官课题研究顾问、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崔伟(左)与吴玉叶在看样书



吴玉叶与编委、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在交谈编委会工作



吴玉叶与编委、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向春玲(左)在看样书



吴玉叶与编委、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徐祥临(左)在看样书

○每位官员都是我的老师，也都是我的研究对象和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为官者最重要的就是“守信”，要经常用实际行动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

○人无常强无常弱，无常贵无常贱，无常富无常贫……明白这样的道理，就如同长了前后眼！

袁玉印

著者说明

我从1994年8月发表第一篇做人做官的专访文章至今,不知不觉已有17年了。其间,出版了几本书,对有关重大问题也作过深入思考,那几本书里和近日发表的文章中都有。为了便于有关领导和广大读者比较集中地了解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和看法,《做人做官研究》编辑委员会于近日专门抽出三位同志从以前出版的几本书和近日发表的文章中,分成“官德修养”、“智慧胆量”、“为官之道”、“选人用人”、“反腐倡廉”等七个方面作了摘录和梳理,将其集中起来编了这本《做人做官·思想观点归纳篇》——其中的思想观点80%左右是我的;约占20%是几十位领导同志当时接受我采访时谈的,由我记录整理出来的。这本书,是近两年来人民日报出版社继《做人做官·理论篇(第一卷)》《做人做官·实践篇(第一卷)》和《做人做官·综合篇》之后,为我出版的第四本书。

我真诚地感谢人民日报出版社的领导,以及这些书的责任编辑和发行人员;同时,也感谢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我的领导、亲朋和同事!

靠一人之力几乎事事难成,而众人之力则可移山填海。故希望,能有更多的领导和朋友参与做人做官这项课题研究,关心

支持我们。

做人做官课题研究,是一项千秋万代的课题、千秋万代的事业——只要有人类的存在,它始终都会是热点问题。我深信,它会像星星之火一样,早晚有一天,可以燎原的!

张春生

写于2011年6月16日上午

注:本书所有水墨竹插图,均系张春生先生提供。



做人做官研究的思想构架和目的



虽说我是从1994年8月份就开始发表做人做官方面的文章,后来陆续出版了《做人·做官》《怎样当好一把手》和《做人做官的哲学》等书籍,但实际上,直到2003年以前的这些年,我的主要精力还是用在办报办刊及其发行和经营上,也只是顺带地或者说兼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并且这些书籍的内容绝大多数是我对一些领导干部的专访,包括与他们的一些对话。就是说,在这之前,我对做人做官还没有作过深入的、全面的研究。

2003年,我决定把它作为终身课题研究后,才算投入相对多的精力去思考。可是,直到2008年这几年间,客观事实还是没能真正如我所愿:在北京新创办的两本杂志几乎占据了我所有工作时间,使我很难抽出身心顾及这些。

当然,我既把它作为终身研究课题提出来了,总还是在工作之余苦苦地作了一番深入思考的。我当时思考出来的主要问

题,即是人和人的根本或最大差别就在于“想”和“做”的不同。通过这样的思考,我想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为什么都要求下级服从上级,最终服从最高当权者或指挥者呢?原因是人们的思想太发散、太杂乱了——面对一个人、一个事物,往往百人有百种看法,千人有千种看法,万人有万种看法……如果不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就无法统一思想,甚至无法去做任何一件事,更无法建立一个组织、政党或国家。——从这一方面来看,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都需要“下级服从上级”,否则,就会出现天下大乱、永无宁日的局面。二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正因为人之想法和思想千差万别,所以才需要在理论界和思想界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唯有如此,思想才能进步,理论才能创新。这种进步的和创新的理论的强大合力,才能不断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

要想解决好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对于领导者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不能人云亦云,必须有自己的主见、坚强的意志力和“铁”的手腕。否则,就说明自己不具有捏沙成团的本领,也不可能把千奇百怪的思想统一起来,更不可能把散乱的步伐一致起来。最终,将会因自己的软弱无能而彻底毁掉一个单位或地方。要想解决好另一个方面的问题,领导者又必须具有超人的心胸和雅量,允许思想理论界人士发表各种不同的新思想、新观点,而后,择善而从,以便于更好地开展和推动工作。新颖正确

的理论或思想,则是人类时代的精华和指引人们正确前行的路标。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在解决好第一个问题的同时,也能够妥善解决和处理好第二个问题。

至于如何解决,这是没有固定方法的,只能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运用之妙”只能“存乎一心”。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也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二

到了2008年,我才算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做人做官课题上来。我当时就有这样的想法:作为一个研究者,要想把这个课题研究好,就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必须从整体和全局上思考问题。

基于这种想法,在研究过程中,我有时也会像演员一样,——比如古月和唐国强,他们在饰演毛泽东的时候,就不能想着他是古月或唐国强,若是这样,其气质、高度、心胸、气派就出不来了。只有想象自己就是伟人,肩负着巨大的政治责任并站在伟人的高度,胸怀天下,目视全球;这样去看待问题,思考问题,才有望达到一种高度和境界。

根据这样的思路,我通过反复的沉思,便有了“人以正立,兵以诈立,事以奇立”的思想构架和“人人自尊,人人自强,而后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

所谓的人以正立,就是要求每个人都要努力做到心正,身正,想的正,说的正,做的正。如何才能实现这些“正”呢?这就

得要求一家之长和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主要领导人,都应该用做人方面的“正”做出榜样,影响、教育、教化人们首先把人做好。其次或同时,还要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去领导和引导人们想好事情,干好工作。如果全国每个家庭的家长,每个单位或地方的主要领导人,甚至更高领导人,都能做到心是正的,身是正的,想的是正的,说的是正的,做的是正的,那这种遍地开花的榜样精神和力量将是无穷的、巨大的,它将会无声地引导、教化着几乎所有的人。如果再加上这些家长和各单位、各地方主要领导人,甚至更高领导人的主动引导和教化,那么这种“正”的影响力将会更加巨大。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就好比唐代诗人岑参所描绘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那样——很快就会传遍全国各地的。当然,这只是个比喻,事实上,不可能来得那么快——一夜之间就解决问题。但是,只要我们有了这种想法和行动,并不断地、努力地、一步一步地朝着这个方面去行走,总有一天,我们会实现这一目标或理想的。如果能实现这一理想,我们国家才算做到了真正的和谐;如果能实现这一理想,我们就能远远地超过当年孔子所推崇的西周之道德风尚;如果能实现这一理想,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才会更加文明!要想早日实现这一目标,最佳途径就是,把全国各行政村以上(包括行政村)的主要领导人尽快地都配上德才最优者。何为德才最优的呢?很简单,当提起他们的道德人品时,应该让人肃然起敬;谈起能力政绩时,让人由衷钦佩。——在他

们的坚强领导,榜样力量的推动和影响下,就一定会逐渐实现上述美好的设想和愿望。如此一来,贪污腐化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等,也都会随之改变或好转,一个美好的明天必将到来!

所谓的兵以诈立,这个“兵”,在这里并非指士兵和兵器,而是专指战争。《孙子兵法》开篇所说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此处的“兵”,也就是指战争。就是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一国之君,都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因为这涉及到民之安危、国之存亡。至于“诈”,这与道义上的欺骗、欺诈绝非一回事,而是指在战争中为了取胜使用的谋略和智慧。它是《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也是古代兵法中用兵的核心规律。孙子认为:“兵者,诡道也。”就连韩非子也说:“战阵之间,不厌诈伪。”也就是说,用兵是一种诡诈的行为,要想赢得战争的主动与胜利,就应该懂得诡诈和兵不厌诈的重要作用及其妙用——这是指挥家指挥的奥秘。人类的战争史告诉我们,人力、物力的多寡和武器的先进与否,虽然对胜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用兵的方法谋略和智慧,往往则更为重要。古今中外无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就足以证明或说明了这一点。我之所以提出“兵以诈立”的目的,就是本着“天下兴亡,人人有责”的想法,建议我们国家和各省市的主要领导人(他们也大多在军队兼职),一定要再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有人类的存在,永远都会有斗争和战争,这是一个改变不了的残酷事实。尤其是当今世界,并不太平,这就更需要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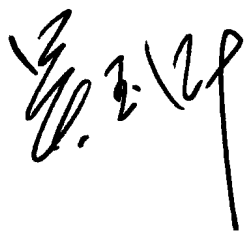
强国防意识,努力学习军事知识,掌握军事动态和用兵之道。当然,我这样说,也仅仅是建议我们的领导者要时刻防御或预防着外敌的入侵而已,不能像南唐后主李煜那样,守着“四十年来家国情,三千里地山河”,却不曾识干戈,最后成了“臣虏”。我这样建议,并非希望我国各级领导人都成为好战分子,——我们中华民族向来都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中国的兵家文化和儒家文化一样,其根本精神都是和合文化,一直都倡导亲仁善邻、积极防御。所以希望读者朋友要正确理解我的上述思想和观点。个别朋友对我谈军事这一点不甚理解,认为这与做人做官关系不大;殊不知,这乃是关系最大的问题之一。试想,如果我们的官员连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都保护不了,还能是好官吗?又怎么能奢谈让人民过上幸福、安康、和谐、有尊严的生活呢?凡事都有轻重大小,对于领导者而言,保国安民则是最为重要的。保国安民的首要条件,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国防和军事建设、深谙用兵之道。其实,我的总体想法,重视谋略智慧不仅仅体现在军事方面,应该在很多方面,诸如政治、外交等等;也不仅仅只是重视谋略智慧,更应该很好地重视和使用有谋略智慧的人,因为这是富民强国最为重要的条件或法宝!

所谓的事以奇立,就是要在学习和做事方面懂得求异、求变和创新。求异、求变和创新对一人、一家、一单位、一地方、一国家来说,永远都是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制胜法宝和灵魂。纵观我国的近现代史,便能深知这一道理。18世纪末,英国曾派一

一个叫马嘎尔尼的使臣到中国来拜见乾隆皇帝,希望打开中国的市场。当时的乾隆,眼界犹如井底之蛙,竟说我们是天朝上国,不稀罕他们外国的玩意儿,允许他们来只是表示我们的宽大而已。乾隆的这一心态,也代表着当时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心态。当时的中国人大多不了解世界,夜郎自大,看不起其它国家。可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打了败仗,不但割地、赔款,还五口通商,订下了《江宁条约》(也叫《南京条约》)。而后,英法联军又火烧了圆明园……我们连续打败仗,一直到八国联军把北京都打下来了,这时,很多人才觉悟到我们按老一套不能应付如今的世界了,所以才想到求异、求变和创新。……通过一系列的求异、求变和创新,我们国家才逐渐地好了起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最近30年,才逐渐地强大起来。当然,我们的强大,与美国比,还差得很远。所以,我们才更应该重视求异、求变和创新,争取以最快速度赶上或超过强大于我们的国家。——这也是我们不受欺辱的先决条件。值得说明的是,我说的求异、求变和创新,决非是指在某一方面,而是指在许多方面。因为,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如果离开了求异、求变和创新,都将是不能前进和发展的,更谈不上强大起来。做好任何事情都需要有特定的土壤和环境,求异、求变和创新更是如此。故希望,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环境宽松、宽松、再宽松些;鼓励和支持的力度大些、大些、再大些,因为这关系和决定着我国国家经济、社会 and 军事等方面发展的速度,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我说的这三点,皆可用一句话高度概括:正,是立身治国的根本;诈,是保国安民的重要手段或保证;奇,则是发展强国的生命和灵魂。我这样提出或设计的目的,就是希望人人自尊,人人自强,最终实现民富国强,使我们国家永远屹立于强国之列,在不欺辱他国的同时,也不再遭到他国的欺辱。

以上,是截至目前我在大的方面的研究和思考情况,也是我认真地向有关领导和朋友作的一个简短而系统的工作与思想汇报。仅供领导同志参考;望能与朋友求同存异,相互探讨与勉励。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张无忌' (Zhang Wuyi),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写于 2011 年 7 月 2 日上午

研究工作须臾离不开智勇^①

我们中国有个思想家、哲学家叫梁漱溟，他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他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很有意思：“一说到学问，普通人总以为知道的很多，处处显得很渊博才算学问。其实就是渊博也不算学问。那什么才算学问呢？就是能将眼前的道理和材料系统化、深刻化。更扼要地说，就是‘学问贵能得要’，能得要才算学问。如何才是得要？就是在自己这一方面能从许多东西中简而约之成为几个简单的要点，甚或只成功几个名词，就已够了。一切学问家都是如此……。”

我复述梁先生的这段话，并非说我也是学问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只是个学生——我早已声明了愿做一辈子的小学生。但是，我能在做人做官研究方面“简而约之”地、“扼要”地提出“三立”（人以正立、兵以诈立、事以奇立）治国方略，——不管别人怎么看，就我来说，还是很欣慰的。加之我把这项研究理

^①此文系吴玉叶同志在合肥召开的部分顾问座谈会上的讲话